

中央苏区的读报运动

□ 邱 明

读报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开展以党报党刊为主要内容、与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相结合的集体性学习活动。中央苏区时期，读报运动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达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群众知识文化水平、扩大党报党刊影响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

由于中央苏区地处偏远山区，经济社会极为落后，老百姓普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开展土地革命，首先迫切需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帮助群众读懂革命的目的和方式。中央苏区读报运动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初始阶段。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井冈山斗争时期组织推广了读报运动。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就党内教育的问题，提出利用党报，开展“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及“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等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清除红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红军从创办各种简易刊物、成立宣传队起步，广泛采用简便易行的传播手段，如标语、歌谣、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方式，来发动群众读报。部队和群众中逐步建立起读报小组，读报成为政治学习和文化教育的重要方式。

二是发展阶段。1930年2月至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毛泽东领导红军各基层单位创办《时事简报》，号召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都参与读报。与此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读报运动，1931年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明确要求各地举办“读报班”。1931年7月1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在《青年实话》创刊号上号召青年群众正式开展“读报运动”，这是中央苏区首次将读报从“活动”上升

到“运动”的层面，标志着读报运动全面铺开。

三是高潮阶段。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红色中华》《斗争》《红星》《苏区工人》等党报党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为大规模开展读报运动创造了良好条件，读报运动覆盖面迅速扩大到中央苏区党政军民的各个方面，各地普遍建立起读报组、识字班，设立列宁室俱乐部，建立读报规章制度，开展读报竞赛等。

四是延续阶段。1934年10月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红星》报，一有闲暇就组织红军战士读报，开展政治思想教育，鼓舞斗志。

“讲报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法”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推动下，中央苏区读报运动从党内走向广大基层群众，逐步从散、小、弱走向了规模化、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建立读报场所列宁室俱乐部。列宁室制定了专门的读报工作计划，不断创新新方法，提高了群众参与读报的积极性。各小组长经常进行宣传引导，吸引群众来到列宁室看书报、研究问题、参加活动。

规定读报的主要内容。读报主要读墙报和党报党刊，不同人群所读的党报党刊各有侧重。其中，《斗争》是各级党组织的必读刊物，《红色中华》报是广大群众的普读刊物，红军战士必读《红星》报，青年团员和儿童团必读《青年实话》，工人必读《苏区工人》，以及各省县苏维埃、各军政治部、各行业办的机关报分别被相应群体列为读报内容。

明确读报的方式方法。根据文化程度的高低分成不同的读报班，每个读报班人数控制在10人左右，最多不超过20人，读报时间一般在农闲时节和夜校活动，由墙报委员、通讯员或者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担任领读员，带领全班读报、讨论和竞赛。群众读报之后，有的将读报体会写信告诉前线的红军战士，鼓励他们奋勇杀敌；有的向党报党刊投稿，抒发对苏区生活的热爱和建设工农民主政权的热情。

讲究读报的技巧。一是灵活性。红军行军打仗，利用中途休息随时随地开展读报、识字、唱歌、猜谜、讲革命故事等，使战士们不感到疲劳。二是形象性。比如在列宁室挂一幅《红色中华》报刊载的地图《国民党公开出卖了半个中国》，吸引群众来看地图和听时事报告，把时事报告像说故事一样地讲出来。三是趣味性。比如《红色中华》报刊登了通讯《两只山歌煽动全屋（一个宣传队员的笔记）》，宣传员在夜校里很活泼地唱起山歌，吸引群众挤到夜校里来听山歌，然后宣传员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进行宣传，还发动群众做草鞋、竹碗等慰劳品。四是多样性。《红色中华》报开设了“宣传工作介绍”专栏，以期推动读报运动。比如《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的讲报工作》介绍了讲报的做法和经验，先由教员向3至5名听报员讲报，再由听报员分别到群众中去讲报，读报受众面迅速扩大到二三百人。文章号召各地学习官山乡的读报经验，提出：“讲报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法呵，每个乡都应该建立这一工作呵！”

“好快活的一天过一天”

读报运动在提升群众政治觉悟、动员支持革命战争、促进苏区政权建设、提高群众文化程度等方面产生了积极

影响。

凝聚人心，提升群众政治觉悟。各行各业的党员群众积极购买党报党刊，工作人员组织政治讨论会，讨论党及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的决议与策略路线，使政治水平较低的同志对政治形势有更深刻的认识。

鼓舞士气，动员支持革命战争。红军与群众通过读报来互相鼓励，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共抗强敌。前方红军战士热情地参与读报、唱歌、呼口号、讲故事，斗志昂扬，随时准备冲锋杀敌。后方红军家属参加夜校组织的读报课，最喜欢听前方的胜利消息和各地动员情形，“他们总要兴奋得跳起来”。

动员力量，促进苏区政权建设。读报运动鼓舞了民心，激发了斗志，引导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投身到苏维埃建设工作中。比如在经济战线方面，党员群众踊跃购买经济建设公债，有的还把伙食尾子节省下来购买公债券。在拥军优属方面，瑞金全县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给全苏区红军家属发出通电，提出做“模范苏维埃公民”的七个条件，条件之一就是红军家属“要做到人人都会看红色中华”。

扫盲教育，提高群众文化程度。读报运动与扫盲、识字、夜校相结合，极大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学习积极性，成为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一大创举。识字班是读报运动中常见的组织，《红色中华》报经常被识字班列为教学材料。这种识字的过程可谓一举两得，群众既可以学文字使用和表达技巧，又可以获得大量的时局信息。大批苏区群众因此摘掉了文盲半文盲的帽子，许多适龄儿童走进了学校。据《青年实话》载，印刷厂青年工人张一台在写给战斗在火线的哥哥张一昌的信中说：“我天天都有新的报纸杂志啦，比较重要的就有读报班的同志讲给我们听”“好快活的一天过一天”。

杨庄三年艰苦抗战岁月的生动见证

——冀南抗日根据地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牛贵葆 闫洪涛 马章文



冀南区抗日烈士陵园位于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大王寨镇杨庄村，建于2012年10月，占地5.6亩，园内安设56座烈士卧碑，北侧建有烈士纪念厅，厅内安放一尊大型纪念烈士雕塑。烈士陵园中央矗立着一座泰山石料制作的纪念碑，底座高0.6米，碑身高1.8米，正面刻有陈知建（陈康之子）题写的碑名——冀南抗日根据地烈士纪念碑，背面刻有莘县政协原副主席杨巨源撰写的《杨庄冀南抗日烈士纪念碑记》，全文如下：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军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囚笼”政策，不断发动“铁壁合围”式的“扫荡”，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南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斗争形势迅速恶化。为了适应抗战需要，上级决定将莘县和朝北合并为莘朝县，划归冀南区领导。中共冀南区党委及部分行署机关在区委书记兼军政委宋任穷率领下进驻莘朝县杨庄村。杨庄是马西一带著名的抗日模范村，群众政治基础好，地理环境优越，冀南区机关军政人员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

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开挖交通壕和地道，建立兵工厂、后方医院、冀南银行、印刷所、抗日文工团，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和“扫荡”，使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严峻而困难的形势下，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以弱对强，不怕牺牲，有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就长眠在这块光荣的土地上。据统计，共有一百零三名伤病员牺牲并安葬于此，后来陆续迁走一部分，至今仍有五十六名无名烈士埋葬在这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怀念先烈教育后人，中共莘县县委、莘县人民政府特树碑刊石，开国大将陈康之子陈知建将军亲笔题写碑名，以为永久纪念。碑成之日，略述由来，是为记。

莘县人民政府立
公元二〇一二年七月

碑文概述了宋任穷等老一辈革命家带领中共冀南区党委及部分行署机关在杨庄艰苦抗战的历史，缅怀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先烈，阐明“碑成之日，略述由来”的目的。敬读碑文，令人肃然起敬、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千里辗转至杨庄，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新阶段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由于日军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囚笼”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冀南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抗战形势极其严峻。对此，经刘伯承、邓小平同意，时任中共冀南区委员会书记、冀南区行署主任、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率领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及部分后方机关，从河北陆续转移到朝北县（现属山东省莘县）大王寨镇杨庄村，指挥冀南区的革命斗争。时杨庄村隶属冀鲁豫军区三

分区，是朝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宋任穷进驻杨庄的时间是1942年夏至1944年5月，是冀南抗战极为艰难困苦的时期。1943年先是旱灾，七八个月没下雨。干旱未缓，虫灾又起，传染病情也相当严重。上级建议把冀南区领导机关搬到平汉线以西去办公。但是宋任穷主动担起留驻冀南领导重任，“咬紧牙关渡难关”，继续坚持斗争，人称“咬牙干部”。为了战胜灾荒，减轻群众负担，宋任穷亲自带领干部战士在杨庄村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开荒种地、种植粮食。没有牲口，大家人力拉犁种地。在杨庄村，宋任穷组织带领群众开挖地道，并先后创办了抗战兵工厂、抗战医院、冀南银行、抗战被服厂、抗战小学等。抗战地道从杨庄通向武家河、玉庄、余庄、尧头、西田庄等十几个村子，总长20多公里。地道里不仅能隐藏兵源、群众，还能囤积弹药、兵工生产设备等。

冀南抗战武器装备消耗很大，为此宋任穷进驻杨庄不久，在杨庄村西北角抗战堡垒户夏高升家大院子里开办了兵工厂。兵工厂有几十名干部战士，以铜钱、铜板为原料，制造步枪、子弹和复装子弹（指的是在战场上捡到子弹壳后，将其重新装药制造的翻新子弹）。他们自制发明了黄色炸药，用它代替过去造手榴弹用的黑色炸药。短短的六七个月时间，兵工厂就用黄色炸药造出了1300多箱手榴弹，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兵工厂还有一个“功劳”就是修复日式“九二步兵炮”。1941年初，八路军主力部队在潘溪渡伏击战中缴获了一门“九二步兵炮”。由于这门炮用过量过火，出了故障，最后辗转送到杨庄兵工厂。副厂长杨其延、军械战士盖亮、杨玉堂连夜抢修。可在

试射中，盖亮不慎被炸伤。后经过几次试验，终于试射成功，从此，这门炮伴随着宋任穷的部队，相继投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打掉敌人地堡、碉堡240余座，炸死炸伤敌人1670余人，俘虏敌人540余人。这门炮战功显赫，被誉为“盖亮炮”。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

创建抗战医院，治疗大量八路军伤病员

宋任穷进入杨庄后，由于对敌作战次数频繁，部队出现了大量伤病员。为此，杨庄抗战医院应运而生。开始，抗战医院设在村民王扶林家中，后搬至杨庄西大寺。抗战医院有医护人员37名，医疗设备简陋、药品奇缺。每天救治伤员二三十人。对于轻伤员，通常一个农户家住一个，重伤员集中在西大寺治疗。在敌后抗日战争中，杨庄抗战医院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医院，医院是无形的，除了西大寺外，领导干部和医护人员都分散在杨庄村及周围广大农村中，全着便衣，吃住在农村。敌后抗战环境极其复杂和残酷，人人看不到医院，更看不到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只能背着一个自己动手缝制的土布旧挎包，内装简单换药器材和药品，定期不定期地到杨庄村及周围村庄住有伤病员的农户家中进行巡诊。3年时间，杨庄抗战医院共救治了1800名重伤员，3700名轻伤员和大量抗日民众，其中有103名重伤员因抢救无效而牺牲。这些牺牲的八路军伤病员，被杨庄群众分别埋葬在杨庄80多亩的西大寺寺田里。新中国成立后，一部烈士遗骨被迁走，仍剩余50余座烈士坟墓，成为艰苦抗战岁月的生动见证。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古柏是红军第二十一纵队和江西寻乌苏区的创始人，是中央苏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之一。中央红军长征后，古柏留在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斗争，于1935年春不幸牺牲。1937年秋，毛泽东得知古柏殉难的消息后，极为哀痛，亲笔题词悼念：“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古柏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用热血和青春践行了誓言：愿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

信者不惧的共产主义青年战士。古柏1906年12月9日出生于江西省寻乌县董乡塘背村。在小学读书时，古柏才思敏捷、爱好诗文，被乡里亲朋所赏识。有次村里举行庙会，乡亲们请古柏给庙门写副对联，他提笔就写下：占人田地，谋人妻子，残害鳏寡孤独，这样凶徒，任其烧香都无益；孝于父母，悌于兄弟，和睦乡里亲邻，若果良民，到来不拜也何妨。门联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古柏不满土豪劣绅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压迫。

1920年，古柏进入广东省梅县广益中学读书。在求学期间，他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进步。1924年7月，古柏联络在京、沪、粤等地求学的寻乌籍进步学生，创办革命刊物《寻乌》，针砭时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925年夏，五卅运动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古柏领导梅县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并于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的古柏就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很快发起成立留粤校友会、寻乌平民合作社，作为学生运动的组织机构，来吸纳更多的进步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古柏还趁假期返乡调研的时机，不余遗力地向农民宣讲革命道理。一位长辈曾劝告回村的古柏：“政党初期的发展，一定会有许多为之付出生命的信仰者，来铺平道路。古柏，难道你愿意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古柏坚定地回答：“我愿意这样做！没有铺路的人，哪里会有中国革命的康庄大道？”这位长者惊讶地望着他，又问道：“难道你不怕死？”古柏更坚定地回答：“信者不惧！”正是因为怀有这种对共产主义坚定的理想信念，使古柏无论何时、身处何境，都对中国共产党一往无前、无所畏惧。

“英俊奋发”的红军高级指挥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古柏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同邓才诚、刘维铎、潘叶煌等创建寻乌首个党组织——中共寻乌支部。

1928年春，中共寻乌支部根据中共赣南特委指示，决定举行全县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3月25日黎明，寻乌城南一声枪响打响了寻乌“三·二五”暴动的第一枪。古柏提着短枪，站在城南营盘山上，指挥城南四乡农民和进步学生攻打寻乌县城。3月28日，革命队伍遭到寻乌、安远、会昌三县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的疯狂反扑。为保存革命力量，古柏深入地分析当时的斗争形势，提出分散隐蔽、待机恢复革命的建议，获得大家的一致同意。

“三·二五”暴动后，古柏进一步认识到组建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他重新整合暴动后留下来的革命力量，组建了一支精干的游击队伍。1929年1月，古柏在寻乌葛蒲圩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寻乌的革命斗争形势。毛泽东鼓励古柏要在寻乌广泛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 and 红色政权，并将红四军一部留下来帮助古柏发展壮大寻乌革命武装。古柏将红四军一部和当地游击队伍合编为红军第二十一纵队，在寻乌、兴宁两县交界的阳天峰周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年10月，中共寻乌支部扩大为中共寻乌县委员会，同时成立寻乌县军事委员会，古柏任县委书记兼县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他率领红军第二十一纵队拔除寻乌县内的多个地主武装据点，创建了寻乌革命根据地，并在全县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支持者。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再次来到寻乌，联合古柏指挥的红军纵队一举攻克寻乌县城。

古柏：愿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

□ 沈冰鹤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为了弄清中国富农问题和城市商业情况，毛泽东利用红军战事较少的空隙，在古柏的协助下对寻乌展开深入的社会调查，这就是著名的“寻乌调查”。毛泽东对古柏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寻乌调查》中写道，“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正因为这段经历，古柏被党组织调到毛泽东身边从事秘书工作，跟随红四军转战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尽心竭力地协助毛泽东处理党政军工作，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古柏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有着深刻的领会。他反对当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1933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在江西错误地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亦即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他们把包括古柏在内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四人，诬称为“所谓毛派的头子”，要加大“斗争火力”对四人进行“残酷的斗争”。古柏始终没有放弃原则，继续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即使面对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威胁，仍泰然处之，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

1934年11月，中央苏区全部沦陷，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血腥屠杀、疯狂报复。古柏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带领游击纵队转战到粤赣边山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牵制敌人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1935年春，古柏带领游击纵队从江西安远出发赴广东龙川县联络五兴龙游击队。当走到上坪鸳鸯坑一带林区时，因林区纸厂一位杂工的出卖，古柏等人被国民党龙川县警卫队包围。危急关头，古柏立即率领队伍同百余敌人展开游击战，因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最后在掩护游击队员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